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 20 世纪 60 年代 中日民间贸易的影响

徐 建 华

(深圳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作者简介] 徐建华(1976-), 女, 江西德兴人,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史研究。

[摘 要] 20 世纪 60 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在经历池田内阁时期的高速发展后, 到佐藤内阁时期出现突然的降温和滑坡。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出现突变的关键原因在于: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实施改变了日本战后在亚洲的贸易结构, 使得中日贸易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为下降; 与此同时, 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 美国要求实现日美远东战略换肩, 这促使日本对其外交政策, 特别是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以加强对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配合。

[关键词]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 中日民间贸易; 20 世纪 60 年代

[中图分类号] D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108-06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 由于未能从根本上结束敌对状态, 中日两国关系发展极不正常, 而中日民间贸易则是体现这种不正常中日关系的晴雨表。随着形势的变化, 时而发展顺畅, 时而进展受阻, 甚至发生逆转, 反映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势。佐藤内阁上台后, 从池田时期“向前看”的积极政策完全转变为追随美国, 包围和遏制中国, 推行“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亲台反华政策, 致使池田内阁时期好不容易发展到“半官半民”阶段的中日关系^[1](第 64 页), 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反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甚至面临全面断绝的危险。与之相对应, 中日民间贸易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从大发展到严重受阻, 甚至濒临停滞的过程。中日关系和中日民间贸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倒退和逆转? 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放在东亚冷战的整体背景下, 分析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关系的影响。

—

池田内阁时期,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日民间贸易也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1960 年初,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日本经济报告的重点已经从强调日本经济的脆弱性转移到惊叹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上来^[2](000224)。由于执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 日本出现了设备过剩和生产过剩的现象, 产业界要求扩大中日贸易的呼声日益增强。在此情况下, 首相池田强调: “日本传统上和历史上与中国大陆有特殊关系。日中贸易水平至少应该与当前西欧国家对华贸易水平相当。”^[3](第 31 页) 日本希望能和西欧一样使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以增进对华贸易。而此时的中国, 由于中苏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以及国内经济的巨大困难, 也迫切需要拓展其它的市场, 扩大中日贸易额。因此, 尽管中国仍然坚持政治、经济

不可分离的原则,但在对日态度上却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

在中日都有意愿恢复两国贸易的情况下,1962年9月,中日重开民间贸易谈判。日本国会议员松村谦三和高崎达之助先后访问了中国,并与廖承志以“政经不可分”的一致意见为基础交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其内容是在未来的5年间(1963—1967年),以平均每年3500万英镑的规模扩大日中贸易,中国以延期付款的方式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卖方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资金。之后,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日方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事务所。双方同意在对方国家互设常驻的联络机构,并通过这个渠道互派常驻记者。LT办事处虽说是民间贸易机构,但在其背后是日本通产省和中国外贸部,这就决定了其半官方性质。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由此开始恢复和迅速发展,并很快超过了1958年的水平^[3](第53页)。

1963年8月20日,池田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的厂商“仓敷株式会社”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向中国大陆出口价值2200万美元的纺织设备。这种被形容为“援助而非贸易”的发展趋势使台湾感到极度不安,也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发表谈话,警告日本不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在1962年12月3日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会”上,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发出类似警告,之后,哈里曼提交书面通知给日本,表明美国不会支持日本对共产党中国的延期付款贸易的安排。然而,尽管美国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还是于1963年8月批准了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向中国出口纺织设备的延期付款计划。

由此可见,池田时期日中民间贸易关系的高速增长势头是与日本外交自主性增强的趋势相适应的。在佐藤上台之前及其执政初期,这两者都大有继续发展之势。

196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在佐藤竞选班子完成的有关未来佐藤政权内外政策的研究报告里,不仅将“中国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提到了亟待解决的外交问题的首位,而且还具体提出了与中国和平共处、扩大各方面的交流,特别是以输出入银行为担保的经济合作、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日本为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努力、准备派“密使”与中国接触等改善中日关系的具体举措,重新提出了吉田茂曾提出的建议“为美中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日本准备起桥梁作用”。另外,该报告还把中共问题和台湾问题都置于中国问题之下,这表明了佐藤将在“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立场上来把握中日关系^[4](第58-61页)。1964年5月4日,时任池田内阁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的佐藤荣作,秘密同正在访日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会晤,并表示:“如果我掌握政权,将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尽最大努力”^[5](第138页),“希望能在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下进行”^[6](第225页)。即使在竞选失败后,佐藤对日中关系仍然表现出热心。1964年秋,佐藤通过自民党国会议员久野忠治在中间牵线,准备在缅甸首都仰光同周恩来总理直接会晤。

池田因患喉癌辞去自民党总裁和首相职务后,指定佐藤接任其职务。在上台之后第二天即11月10日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佐藤仍强调:“中共问题是日本当前面临的外交上的基本问题,是赋予佐藤内阁的重要问题。”“别的事情办得再好,如果不解决日韩问题和中国问题,仍然会受到批评。”^[7](第66页)佐藤的发言说明他在改善对华关系问题上依然是非常积极的,预备将其作为新政府的首要问题来解决。

但是,佐藤这种在对华关系上欲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短短十几天后,在11月21日召开的第47届临时国会的政见演说中,他说道:“政府历来同中华民国政府维持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同中国大陆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与民间保持了贸易及其他事实上的接触。在中共进行核试验的今天,我也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方针的打算,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中国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我想斟酌今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慎重而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8](第3-4页)在这一演说中,佐藤表示他将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不仅在对华关系不会进行重大突破,而且还要根据国际形势,慎重对待日中关系的发展。这与他之前的说法可谓大相径庭,原先“积极的”、“向前看”的态度一下子变为“慎重”和“保守”。在发表这一演说的前一天,佐藤内阁拒绝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市长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入境参加日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申请。彭真此行日本,本是日中政界高层人士之间直接进行接触并互相沟通的绝好机会,但佐藤拒绝彭真入境,就意味着佐藤并不希望借此良机改善日中关系,表明了他的对华态度。接着,佐藤内阁又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继续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佐藤这种在日中关系上的消极态度和阻挠日中关系发展的做法,理所当然受到中国政府的抨击,1964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抨击佐藤以前改善中日关系言论之虚伪,指出其破坏中日关系的事实^[9](第766-768页)。

随着佐藤对华政策从热到冷的突变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冲击,中日民间贸易自然也随之受影响。其中产生最严重影响的是“吉田书简”对日中贸易的约束力问题。前文谈到,池田政府顶着美国的压力,于1963年8月批准了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向中国出口纺织设备的延期付款计划。事实上,使不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问题,还涉及到是否希望扩大日中贸易,是否希望在“政经不可分”原则下,通过不断积累的方式继续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问题。因此,台湾当局对此十分关注和不安,日台关系一度因此非常紧张,台湾甚至达到了撤走大使,要和日本断绝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地步。为了安抚台湾当局,美国政府开始出面警告日本^[10](118E),日本也被迫必须有所表示。因此,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受池田委托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会面,以书简形式保证日本不会再向中国大陆提供金融出口。尽管如此,在池田时期,池田是以私人信件来对待“吉田书简”的,再加上池田很快引退,所以“吉田书简”并未对中日贸易产生太多不利影响。

1965年2月8日,佐藤上台后,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称:“吉田书简”虽然是以私人名义发出的,但这与当时政府的方向并不是完全相左的。“吉田书简”对日中贸易有约束力,日本政府将遵循“吉田书简”不再向中国大陆提供金融出口的承诺^[11](第242页)。佐藤的这一宣称立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愤怒,中国政府采取断然反击,随即取消了与日本公司的一系列合同并从其它谈判中退出。4月8日、5月10日,《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对佐藤政府不抱任何幻想”,谴责“佐藤政府必须承担破坏日中贸易的全部责任”。以此为开端,中日贸易关系迅速降温。

二

为什么佐藤政府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态度会先热后冷,出现从积极到反动的突然变化,并导致中日民间贸易关系的迅速降温和倒退呢?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当时东亚的冷战局势以及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调整。

佐藤上台之后,面临的是中法建交、越南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核试验、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关系紧张等动荡的周边国际形势。其中,对日本外交政策带来最大影响的便是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与不断升级,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东亚战略的重大调整。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和扩大,美国东亚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为了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和实施其远东战略,也为了继续进行越南战争,美国迫切要求日本在东亚地区代替美国承担一部分以前美国在这一地区履行的“义务”和“责任”,代替美国部分地承担对亚洲各国的“援助”,以便继续稳定亚洲的“自由阵营”。1965年4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东南亚计划”,“希望日本在支持和鼓励亚洲开发方面起建设性作用”^[12](第36页)。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日本的一次演说中说:“使亚洲继续成为自由而友好的地区,这不仅对美国有利,对日本更有好处”,“为了确保亚洲的安全,日本应以经济合作筑成‘弹性壁垒’,为此日本要起带头作用”,并提出了“对亚洲的经济开发要在亚洲国家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口号。

佐藤上台后,立即敏锐地把握到美国东亚战略这一调整给日本所带来的契机。日本从1956年起开始现代化起飞,经过池田内阁时期的“收入倍增计划”,经济实力已经有了空前的增强。196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806亿美元,继美国、西德、英国、法国之后占资本主义世界第5位^[13](第318页)。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已经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几乎完全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发展或者保持充当小伙伴的

习惯了^[14] (第169页), 日本希望的是不断提高内政外交中的独立自主性, 不断提高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增强日本在安保体系中的发言权, 同时谋求加强在亚太和东南亚地区的更大的经济、政治影响力。美国东亚战略的这一调整正是日本实现以上目标的大好机会。

因此, 佐藤政府决心把握机会, 对日本对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紧密追随并配合美国的东亚政策, 以期寻求自己的利益。佐藤表示: “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日本说成仅仅是亚洲的日本, 而必须要以站在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力量的地位, 树立起全球观点”, 他扬言: “日本的作用在于, 为增加世界的福利, 要同欧洲先进国合作解决南北问题, 尤其要解决亚洲的安全问题。”^[15] (第688-691页)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 在中国问题上, 佐藤也决定谨慎从事。他先降低调门, 一改上台之前在对华问题上的积极论调, 接着不顾“参觐交代”之嫌, 于1965年1月10日率幕僚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约翰逊进行会谈, 就中国问题、越南战争和亚洲局势等问题与约翰逊交换了意见。这次访美对佐藤内阁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佐藤感到“美国比以往更加关心亚洲问题”, 并充分体会和认识到美国“防止中共入侵邻近地区的政策”, 因此在第48届国会上对内阁对外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佐藤认为, 在美国政界普遍认为共产党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扩张, 鲸吞东南亚的情况下, 在中美关系因越南战争的爆发而再度激化之际, 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 莫如投其所好, 通过为美国的侵越战争和霸权政策提供合作, 一方面为日益膨胀的日本经济解决市场和原料问题, 同时增强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和日美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地位 and 作用, 提高日本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因此, 佐藤把此前信誓旦旦准备重点解决的“中国问题”, 一下降格为“对我国来说不能急于胡乱下结论, 必须以自主观点慎重对待问题”, 而把“排除(亚洲)各国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缓和紧张局势, 建设和平环境”作为首要的外交课题^[8] (第4页)。在与约翰逊会谈之后, 佐藤为了标榜“自主外交”, 虽然分别把两国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写进了联合公报并表示要在与台湾维持所谓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 同中国“根据政治和经济分开的原则, 继续增进现存的贸易等范围内的(中日)民间接触”^[8] (第22页), 但实际上早已打定主意, 决定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坚定不移”的政策, 推行追随美国的亲台反华政策。

三

除了政治利益的考虑之外, 佐藤选择追随美国东亚遏制战略, 坚定反共反华立场的一个现实前提条件还在于: 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 日本经济实力今非昔比, 此时贸易对日本而言不再是个问题; 同时, 美国的东亚遏制战略已经初步改变了日本在亚洲的贸易结构, 东南亚取代中国成为日本在亚洲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中国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不再那么突出了。

朝鲜战争后, 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战略正式形成。阻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传统贸易往来, 帮助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 并促使日本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进行整合, 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核心环节之一^[15] (第35-42页)。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政策实施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日本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佐藤内阁时期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 远远超过了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同时期, 日本的对外贸易也有迅猛的发展, 1965年日本出口额为85亿美元, 但到1970年已上升到200亿美元, 继美国、西德之后, 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16] (第12-19页)。从1965年起, 日本的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黑字, 而且黑字额越来越大。日本经常收支也是自60年代后半叶起, 基本上一直保持着黑字状态。贸易对于日本而言, 已经不再是个难题。

在贸易对象上, 由于美国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推动, 60年代以来, 日本已成为东南亚国家主要的投资者、贸易伙伴和援助国。日本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累积投资已经超过美国, 在菲律宾和新加坡居第二位。除新加坡外, 日本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17] (第24-27页), 1965年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6%, 进口占进口总额的13%^[18] (第55页)。到了1969年, 日本对东南

亚的出口,已经占到日本对外出口总额的 27.8%,进口则占总额的 15.8%^[19](第 129 页)。东南亚已经日益成为日本非常重要的资本输出市场、商品市场及原料产地,而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不可避免下降了。

与此同时,日本通过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援助、贸易和投资,已经初步将东南亚纳入以它自身为“头雁”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系之中。日本不仅对东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援助,而且还通过技术援助、政策交流来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战略。这同日本对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的援助只出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宰有关政策问题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表明日本在东南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开始通过经济关系来为政治外交奠定基础。1966 年,日本外相三木武夫提出了“亚洲——太平洋圈”的构想,旨在寻求日本在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因此,尽管中日贸易在池田内阁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在日美关系及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不可避免地下降了,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已成功地改变了战后日中贸易关系发展的自然趋势以及日本在亚洲的贸易结构。这一现实是佐藤之所以不像之前的历任首相那样关注增加对华贸易,而是追随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坚定反华反共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20 世纪 60 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历程,是一条短暂上升后又迅速下滑并不再升起的抛物线。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性影响的是东亚冷战格局发展和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调整。对于佐藤个人在中日关系恶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的确,佐藤比其前任在态度上更为亲美亲蒋,然而,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或某个领导人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对国际关系的变化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佐藤的反共反华态度并不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必然趋向恶化的主要原因,况且,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从不以“感情论”来处理“中国问题”^[11](第 232 页)。

佐藤从积极到消极、再到全面推行反华政策的逆转过程,反映的是由 60 年代中期东亚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所导致日本国家对外关系的重大调整。在佐藤上台之初所制定的外交腹案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以“不改变日美、日台关系的现状”为前提的,并要随时根据“美国亚洲政策的变化”而调整^[4](第 77-78 页)。之后,在越南战争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激化、中国又取得核试验成功的形势下,佐藤不可能冒着损害日本根本利益之所在的日美关系的危险,去改善日中关系。况且,对于日本而言,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及不断升级所导致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给日本所带来的机会和利益远远超过维持和改善日中关系的利益。日本政府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导致此时期日中关系和日中民间贸易关系恶化的最根本原因。

[参 考 文 献]

- [1] 孙平化. 中日友好随想录[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 [2] “Report on Japan”, 4 May 1960,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hereafter DDRS) (82).
- [3] Akira Iriye & Warren I. Co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C].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9.
- [4] [日] 楠田实. 佐藤政权 2797 天: 上[M]. 东京: 行政问题研究所, 1983.
- [5] 吴学文, 等. 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5.
- [6] [日] 渡边昭夫. 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M]. 东京: 有斐阁, 1985.
- [7] [日] 朝日新闻社. 资料·日本与中国(1945—1971)[M]. 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72.
- [8] [日] 外务省. 我国外交近况(第九号)1965 年 7 月.
- [9] 孙平化, 等.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0] Rusk to Wright, 31 December 1963, DDRS[77].
- [11] [日] 古川万太郎. 日中战后关系史[M]. 东京: 原书房, 1988.
- [12] [日] 山本刚士. 日本外交史[M]. 东京: 三生堂, 1984.
- [13] 张健. 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调整与起飞[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 [14] [美]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 1973 年对外政策报告[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 [15] 胡德坤, 徐建华.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缘起[J] . 世界历史, 2002, (4).
- [16] 安成日, 李金波. 佐藤政权的经济政策与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J] . 现代日本经济, 1994, (4).
- [17] [美] H. 伊. 日本与东盟和南朝鲜的关系: 从依附走向相互依存[J] . 国外社会科学情报, 1984, (11).
- [18] [日] 丸山静雄. 东南亚与日本[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19] [日] 行泽健三. 日本经济和亚洲——世界经济和日本(5)[M] . 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70.

(责任编辑 桂 莉)

American East-Asian Containment Strategy and Sino-Japanese trade in 1960' s

XU Jianhua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7,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XU Jianhua(1976-), female, Doctor, Lecturer,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Asia area.

Abstract: After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in the Hayato era, Sino-Japanese trade relations underwent a sudden dissens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at era. There were two key reasons that caused this significant change. Since American East Asia containment strategy had changed Japan' s trade structure in postwar Asia, Sino-Japan trade was not so important as before for Japan'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Vietnam War breaking up and warming up,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look to Japan to implement its new position in East Asia by assuming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commensurate with its strength. Japan adjusted its foreign policy, especially its Chinese policy accordingly.

Key words: American East Asian Containment Strategy; Sino-Japanese trade; the 1960' s